

大理國華嚴經變扉頁圖探究

華梵大學佛教藝術學系 助理教授兼副主任
陳俊吉

摘要

《華嚴經》在中國是一部影響力極大的經典之一，在隋唐之際，祖師大德便依據此經詮釋教義、開宗立派。為了推廣華嚴教法，在唐代時更發展出相關的華嚴經變造像藝術，主要由「七處九會圖」與「華嚴藏海圖」所構成。在唐五代時期，《華嚴經》的流傳主要以抄寫為主，隨著雕版印刷術的發達，到了宋遼金時期，《華嚴經》的流傳改以木雕刊印本為主。此時，為了使經典更加莊嚴，以及強調以圖說法的重要性，有些刊刻《華嚴經》的各卷前後，便加入扉頁圖。當時，中國並非大一統的王朝，宋國北方先後出現遼與金的政權，西北方有西夏，西南方有大理國，這些政權基本上對於佛教展給予扶持態度，使得各國都有發現刊刻《華嚴經》的案例，不乏在經卷中配置扉頁圖，而各地域的扉頁圖呈現出各民族的特色性。本文將大理國刊刻的《華嚴經》，經卷中配置扉頁圖的造像案例，進行探討，釐清其造像特色與時代性意義。

關鍵詞：華嚴教主、華嚴十菩薩、八大菩薩、智拳印

一、前言

宋遼金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地域分治的時代之一，在宋國的西南邊陲有段式家族所建構的大理國之政權，北方先後有契丹人所建立的遼國，以及女真人所建立的金國，這些政權的統治者，大體上相當崇佛，使得佛教得以蓬勃發展。在大理國的佛教造像別具一格，帶有地方民族特色，傳世與出土的佛教文物，主要以立體造像、法器為主，至於刊印佛經與寫經的部分相對較少。

大理國刊印佛經與寫經的傳世之作不多，有其歷史緣由，在永樂十九年(1421年)大理府法藏寺住持大阿黎董賢(生卒年不詳)所撰〈趙州南山大法藏寺碑銘〉記載，明初洪武壬戌(1382年)攻入雲南時，將領大量焚燒大理國所藏經卷，許多文物難逃此浩劫。¹就針對材質而言，經卷與書畫本來就不易保存，尤其在雲南該地氣候潮濕，加速紙張有機質的老化與裂解，使其更不容易存世。而今可見到相關作品，便顯得彌足珍貴。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典藏一件北宋政和六年(1116年)，由當時大理國相國高泰明(?-1116年)，請高僧抄錄一套精美的《維摩詰經》，作為國禮贈於宋國使者。²雲南省博物院藏有大理國天開十九年(1223年)的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一卷。1956年在大理市鳳儀北湯天法藏寺發現一批兩大櫃經卷，其中南詔大理時期寫經達三十餘卷。³1978年至1981年在進行崇聖寺三塔維修時，發現一批佛經，多為密法與華嚴的經典，但多數經典已腐朽碳化無法修復。⁴1981年雲南省文物修復團隊，在修葺大理市佛圖塔(俗稱蛇骨塔)先後發現經卷二批，共十餘種，包含大理國晚期至元代初期佛經。⁵

關於，大理國大量刊刻佛經，應該和入宋迎請佛經有關，最早的記錄在《南詔野史·段智廉傳》記載：「使人入宋，求大藏經一千四百六十五部，置五華樓。」⁶此時，大理國亨天帝段智廉(?-1204年，1200-1204年在位)，遣使入宋求經，和自身篤信佛教有關。此時，南宋帝王為寧宗趙擴(1168-1224年，1194-1224年在位)，正值朝廷準備發動伐金前夕，關於大理國入宋所迎請的藏經為何，文獻中並未詳述，尹恒認為入宋所迎請的藏經應該是圓覺藏。⁷迎藏入大理國後，也帶動大理國的統治者摹刻藏經的風氣。

¹ 碑文云：「今之法藏，乃趙州知周段信祥苴祥、請平老比丘，並楊善等，前來錢塘印造三乘大藏經文，置於本州大華嚴寺。至大明聖世洪武壬戌(1382年)春，天兵入境，經藏毀之。餘等儉歲之中，救得二千許卷，安於石洞。數年之間，切念斯之聖教。唯啟豐珠，為窺全寶。予等前法滇池，於太慈、圓通二寺之中，請的五千餘卷，捋來本郡，合為一藏。洪武三十五年(1392年)命工起茲藏殿，以經置之。」轉引至張錫祿，〈宋明以來華嚴經典在雲南大理的傳播與應用〉，《華嚴學報》第5期(新北市：中華民國佛教華嚴學會，2013年6月)，頁79。

² 李霖燦，《南詔大理國新資料的綜合研究》(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，1967年)，頁3-6。

³ 楊世鈺、趙寅松主編，《大理叢書·大藏經篇》卷一(北京：民族出版社，2008年)，頁34。

⁴ 姜懷英、邱宜充，《大理崇聖寺三塔》(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98年)，頁121-124。

⁵ 楊世鈺、趙寅松主編，《大理叢書·大藏經篇》卷一，頁35。

⁶ 轉引李玉珉，《觀音特展》(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00年)，頁241。

⁷ 陳璞、尹恒編，《雲南古本經籍遺珍十種》(昆明：雲南美術出版社，2013年)，頁7。

目前學界關於大理國的刊經與抄經探討並不多，尤其著重於華嚴領域，以張錫祿發表〈宋明以來華嚴經典在雲南大理的傳播與應用〉一文探討為代表。⁸此外，楊世鈺主編的《大理叢書·大藏經篇》共五卷（冊），也全文收錄大理出土與發現的相關重要刊經與抄經，期中不乏《華嚴經》的內容。⁹但對於大理國刊刻《華嚴經》中的扉頁圖，並未有專門論述探討，故引發筆者好奇，本文將針對筆者所蒐集到，大理國刊刻《華嚴經》中有扉頁圖的部分進行探討，以釐清此時期該地域的華嚴造像特色。

二、佛圖塔出土《華嚴經》的〈文殊菩薩當機啟問圖〉

關於，雲南大理佛圖塔出土的經文資料，因為年代久遠損毀相當嚴重，紙張有機質經過自然老化而脆弱，經卷當時用棕葉繩綁後封泥，有些經卷受到蟲蛀鼠咬之破壞，使得經卷脫落散亂無章。¹⁰世人難以窺知全貌，直到 1993 年才整理出版《大理叢書·大藏經篇》，世人才可窺知其貌。但甚為可惜，在第一卷收錄二張佛圖塔出土的《華嚴經》修復後的扉頁圖，但圖檔甚小，難以窺知細節（圖 1、圖 2）。另外，在第五卷則使用黑白印刷，收錄佛圖塔出土的《華嚴經》內容，但受到印刷媒材的限制，相關扉頁圖的解析度不高，畫面也難以仔細判讀。



圖 1 大理佛圖塔發現《華嚴經》殘卷，已修復。



圖 2 大理佛圖塔發現《華嚴經》殘卷，已修復。

⁸ 張錫祿，〈宋明以來華嚴經典在雲南大理的傳播與應用〉，《華嚴學報》第 5 期，頁 75-109。

⁹ 關於《華嚴經》主要收錄於《大理叢書·大藏經篇》第四卷與第五卷。詳參楊世鈺、趙寅松主編，《大理叢書·大藏經篇》卷四，頁 47-419。《大理叢書·大藏經篇》卷五，頁 411-768。

¹⁰ 張錫祿，〈宋明以來華嚴經典在雲南大理的傳播與應用〉，《華嚴學報》第 5 期，頁 81。

《大理叢書·大藏經篇》第五卷中所刊印佛圖塔出土的《華嚴經》，皆為《八十華嚴》，寫本計有：第六十二卷、六十三卷為長卷殘本，屬於大理國或元初寫本。刻本皆為經折裝，屬於南宋至元初，或大理國晚期至元初製作，計有：卷三，首尾殘缺，僅存中間部分，版心中刻「拱三」，頁碼及序號。卷四，首尾殘缺，僅存中間部分，版心中刻「拱四」，頁碼及序號。卷五，卷首殘缺，版心中刻「拱五」，頁碼及序號。卷二十八，首尾殘缺，僅存中間部分，版心中刻「帙三」、「章六」、「章七」、「章八」，頁碼及序號。卷五十二，卷尾殘缺，版心中刻「黎二」，頁碼及序號，卷首與卷尾皆配置扉頁圖。卷五十四，卷尾殘缺，版心中刻「黎四」，頁碼及序號，卷首配置扉頁圖。卷五十七，卷首殘缺，版心中刻「黎七」、「十六末」，頁碼及序號。卷七十五，卷尾殘缺，版心中刻「臣五」，頁碼及序號，卷首置扉頁圖二張。

相關扉頁圖，皆屬於大理國晚期至元代初期製作，在卷五十二為《八十華嚴·如來出現品》第三十七之三。在卷首與卷尾處，各配置一張〈善財童子圖〉（圖1、圖3），體量甚大的善財童子像為單尊像，呈現童子貌，菩薩裝，當胸合十，跣足而立蓮花之上，善財童子身後配置頭光，上方配置華蓋，華蓋正上方刻榜題「功德藏」。¹¹表示善財童子歷經五十三參，圓滿菩薩行，勵行普賢十大願，累積無量功德藏海，遊戲於華嚴法界之中，故稱功德藏。

在卷首〈善財童子圖〉旁，接續另一幅佛會扉頁圖，〈文殊菩薩當機啟問圖〉（圖4），在扉頁左上隅榜題刊印：「世尊在耆闍崛山，與諸大眾八部鬼神共會說法，爾時會中新發意菩薩欲從佛求長壽，文殊菩薩當機啟問。」¹²該卷經文和此經變扉頁圖，並未直接聯繫關係。首先，該品在《八十華嚴》的七處九會中，屬於第七會普光明殿會，此時，佛在摩竭提國阿蘭若法菩提場的普光明殿中說法，但榜題卻指向摩竭提國的耆闍崛山（靈鷲山），二者地點有所出入。其二，關於榜題中文殊菩薩從佛求長壽的問題，在第七會中經文中並無問佛求長壽的事情，但在第五會兜率天宮會，依據《八十華嚴·十迴向品》會主金剛幢菩薩，發菩提心，增壽，利益一切眾生。¹³其三，在第七會中文殊菩薩並未說法，說法的法主是普賢菩薩，榜題中「文殊菩薩當機啟問」有對應不上的問題。

¹¹ 《大理叢書·大藏經篇》的善財童子圖，在卷第五十二、五十四、七十五都出現善財童子使用同樣的圖，卷五十二榜題抄錄為「功德贊」，卷七十五榜題抄錄為「功德藏」，書中抄錄「功德贊」有誤，應該為「功德藏」。楊世鈺、趙寅松主編，《大理叢書·大藏經篇》卷5，頁603、737。

¹² 楊世鈺、趙寅松主編，《大理叢書·大藏經篇》，頁603。

¹³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云：「『願一切眾生發菩薩心，具足智慧，永保壽命，無有終盡；願一切眾生住無量劫，供一切佛，恭敬勤修，更增壽命；願一切眾生具足修行，離老死法，一切災毒不害其命；願一切眾生具足成就無病惱身，壽命自在，能隨意住；願一切眾生得無盡命，窮未來劫住菩薩行，教化調伏一切眾生；願一切眾生為壽命門，十力善根於中增長；願一切眾生善根具足，得無盡命，成滿大願；願一切眾生悉見諸佛供養承事，住無盡壽，修集善根；願一切眾生於如來處善學所學，得聖法喜無盡壽命；願一切眾生得不老不病，常住命根，勇猛精進，入佛智慧。』是為菩薩摩訶薩住三聚淨戒永斷殺業善根迴向，為令眾生得佛十力圓滿智故。」〔唐〕實叉難陀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二十七，輯錄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第10冊（臺北：世禪出版社，1994年），頁149中-下。



圖3 〈善財童子圖〉，《八十華嚴》卷五十二卷尾處扉頁圖，紙本刊印，高31cm，雲南大理佛圖塔出土。



圖4 〈文殊菩薩當機啟問圖〉，《八十華嚴》卷五十二卷首處扉頁圖，紙本刊印，高31cm，雲南大理佛圖塔出土。

由此看來，〈文殊菩薩當機啟問圖〉可能是借用其他經典的扉頁圖，置放於《華嚴經》某些卷首前方的通用扉頁版畫之一。筆者認為該扉頁圖，可能是《佛說長壽滅罪護諸童子陀羅尼經》的經變情節，該經佛說法處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，在會中有新發意菩薩共四十九人，向佛求長壽命，由文殊師利菩薩代為請示，佛陀宣說此長命壽經，能滅諸重罪而增壽無量。¹⁴這些經文內容與畫面榜題記載，對照有高度一致性吻合。

〈文殊菩薩當機啟問圖〉畫面中如來結跏趺坐蓮臺之上，佛左側站立迦葉尊者，佛右側站立阿難尊者，佛身後兩側共配置七尊菩薩，菩薩之間站立五尊天龍八部護法神，佛的右側站立另一組五尊群像護法神，佛的上方呈現諸佛雲集場面，佛的右下隅，三位人物跪地，班首為文殊菩薩，雙手合十，仰望世尊，恭敬求法，菩薩身旁跪坐一位王者貌，頭頂戴大理王獨特的高冠，手持柄香爐，王身側又跪坐一尊人物。

此外，卷五十二的卷尾接一幅〈善財童子圖〉，同該卷首的〈善財童子圖〉雕版。另外，卷五十四，卷首配置扉頁圖，同卷五十二〈文殊菩薩當機啟問圖〉雕版。在卷五十四卷尾扉頁圖為〈善財童子圖〉，此圖同卷五十二的〈善財童子圖〉。

¹⁴ [唐] 佛陀波利譯，《佛說長壽滅罪護諸童子陀羅尼經》，輯錄《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》第1冊（東京：國書刊行會，1975-1989年），頁394上-下。

三、佛圖塔出土《華嚴經》的〈七處九會圖〉

在卷七十五，卷首的兩幅扉頁圖，首先為〈善財童子圖〉該圖案同卷五十二、卷五十四的〈善財童子圖〉雕版。在〈善財童子圖〉後方接另一幅〈七處九會圖〉（圖5）該畫面一共分為九場畫面，由榜題可知由左至右，由上而下依序排列。

第一會在左上隅，中心描繪一佛結跏趺坐，雙手當胸結智拳印，佛身後大放光明，佛左右側各配置一尊脅侍菩薩，佛前左右方各跪坐一尊供養菩薩。在第一會的正下方為第二會，構圖布局與第一會相似，在佛的正前方多了一尊跪坐請法菩薩。第三會位於第一會右側，其下方為第四會，兩會的中心偏右處，出現一道明顯的殘缺裂痕，但整體上還不影響畫面判讀。第三會中畫面人物布局與第二會相似。第四會，畫面中矗立一棟樓閣，樓閣內端坐一佛，左側配置一尊脅侍菩薩，樓閣外一尊菩薩端坐蓮臺，似乎正在與樓閣內的佛對話，空地前方下面跪坐一群聽法菩薩。第五會位於畫面正中心的上方，即第三會的右側，佛高坐於蓮臺上，佛前平臺跪坐三尊菩薩聞法。

第六會位於第一會下方，其人物配置結構同第一會。第七會位於第六會之右側，畫面主尊為一佛二菩薩式的構圖，但右側的脅侍菩薩已經損毀嚴重，漫滅不明，僅存部分配飾，佛前跪坐一尊人物請法。第八會位於第七會下方，描繪一棟廣大樓閣，屋外祥雲處，站立幾位護法神，闡釋佛在普光講堂說法，但畫面並未將佛說法的場景繪出。

第九會位於畫面的最右側，亦可分為上下兩個部分，上方中央為一座大塔廟，周圍有許多人物圍繞，中善財童子跪坐恭敬求法，表現出經典的第九會，文殊菩薩到福城東，莊嚴幢娑羅林中大塔廟說法，此時，善財童子與諸童子前來聽法。塔廟畫面下方的場景，畫面中心為文殊菩薩，乘坐於獅子身上，善財童子此時已發菩提心，跪地求法，文殊菩薩便指引善財童子南參之行。在文殊菩薩的右側，描繪出一位比丘站在山頂，善財童子站於下方，向上仰望，恭敬合十求法，展現出文殊菩薩指引善財童子南參，首參功德雲比丘的場景，以此代表善財童子開啟南巡問道之旅，最後圓滿佛道，成就菩提。



圖5 〈七處九會圖〉，《八十華嚴》卷七十五卷首處扉頁圖，紙本刊印，高31cm，雲南大理佛圖塔出土。

四、元寧齋藏《華嚴經》的〈七處九會圖〉

大理國時期刊印華嚴經變扉頁圖，除了政府文化有關單位所典藏外，亦有私人收藏的特色精品，在 2013 年雲南美術出版社發行《雲南古本經籍遺珍十種》，書中內容為私人元寧齋所藏的雲南地方古版佛經，其中有一幅刊刻大理國晚期的《華嚴經》卷第四十六，卷首配置扉頁圖（圖 6）。

此卷《華嚴經》經摺裝，書衣部分為藍色布紋包覆，右上方以白字書寫「大方廣佛華嚴經」；右下方以白字書寫「卷第四十六」，經書尺寸高 30.5 公分，寬 11 公分，經書紙質似浸漬皮紙，紙張表面蟲蛀多處，卷首配一幅 5 摺面扉頁圖，後方接經文，每摺面寬 23.2 公分。

經文標題書「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四十六」下方空格，後接「育六」，表示該經卷本為某套大藏經的千字文編號，但歷代所知藏經對不上，該套大藏經刊刻不明，該本極可能為海內外孤本。尹恒認為該刻本可能是依據宋代迎請圓覺藏為底本重新翻刻，在卷首的扉頁畫，又融入大理國的造像風格。¹⁵

該扉頁圖外框使用連續性的金剛杵紋飾裝飾，畫面一共配置八處刊印文字，以及一處榜題墨書文字。畫面右隅處，體量較大的墨框，框內刊印「南無華嚴海會佛菩薩」，闡明該扉頁圖表現，華嚴佛會中諸佛菩薩雲集場景。其餘七處刊印墨書，體量較小。其中，畫面中央的主尊為華嚴教主，佛的左上方刊印「菩提場阿蘭若處」表示第一會，扉頁圖中央佛會兩側，分上、中、下三層，各描繪三座宮殿，每座宮殿皆配置榜題文字，左下為「普光明殿處」表示第二會、第七會、第八會；左中「夜摩天宮處」表示第四會；左上「他化自在天宮處」表示第六會；右下「逝多園林處」表示第九會；右中「忉利天宮處」表示第三會；右上「兜率天宮處」表示第五會。除了第一會以外，其餘各會並未繪製佛菩薩會中雲集的場景，僅描繪出廣大華麗樓閣，以此表示佛會於宮殿內展開。

畫面中央主尊為華嚴教主，面如滿月，螺髮，身披通肩式袈裟，結跏趺坐於蓮臺上，雙手當胸，結智拳印，身後配置大圓光，與大放光明放色性線條，佛上方配置華蓋，華蓋兩側各三尊相對的坐佛，乘祥雲而至，表示十方諸佛雲集。佛兩側各配置四尊菩薩，合計共計八尊，極可能為八大菩薩。佛的正前方跪坐一位請法菩薩，菩薩身旁站立一尊雙手合十，跣足而立的善財童子。佛兩側菩薩的外側，各站立五尊天龍八部的護法神祇。

¹⁵ 陳璞、尹恒編，《雲南古本經籍遺珍十種》，頁 13。



圖6 〈七處九會圖〉，《八十華嚴》卷四十六卷首處扉頁圖，紙本刊印，高 30.5cm，私人藏。

左側護法神祇由下而上需序排列，最下方一尊身著甲冑，右手當胸，左手持金剛杵，應為密跡金剛神。其後方站立一位，頭戴通天寶冠，身著圓領寬袖大袍，手持笏版的天神，應為梵天。梵天的後方右側，一位鬼面臉，張口利牙，逆髮上揚，上身裸體，肩披獸皮，雙手開掌當胸，右手高舉持劍，此位應該為夜叉神。夜叉神的左側一位男性，身著交領長袍，雙手當胸合十，頭戴獅頭帽，應該為香氣供養的樂神乾達婆。夜叉神後方一位男性護法神，雙手持笙吹奏，該畫面的的嘴部殘缺，但按照明初覆刻本來看，呈現鳥嘴，由此來看應為大鵬金翅「迦樓羅」。¹⁶

右側護法神祇由下而上次序排列，最下方一尊身著甲冑，雙當胸抱掌，應為天王。天王後方站立一位六臂護法神，逆髮，兩手當胸合十，兩手舉至肩處，兩手舉至肩上手托日、月，此位應為阿修羅王。阿修羅王左側站立一尊天王，頭戴寶冠，身著交領長袍，雙手持笏版的天神，應為帝釋天。帝釋天的後方站立一位，鬼面臉，張口利牙，逆髮上揚，頭頂戴骷髏頭，胸前披瓔珞，上身裸體，右手持大刀，應為緊那羅。緊那羅上方，一位男性，頭戴冠，穿著寬袖大袍，雙手持一物，是乎法螺，應為龍王。

五、大理國的華嚴經變扉頁圖的特色

宋遼金時期地域分治，遼、金、宋、西夏、大理國，各地域華嚴教法或強或弱皆有其一定影響力，目前發現皆有相關華嚴經變與扉頁圖傳世，但仔細比較可以發現，各地域華嚴表現各有異同，展現出地域性的特色。在大理國的華嚴扉頁造像有以下幾點特色。

¹⁶ 圖片參見，余鍾韻編，《雲南明清經本拓刻選》（昆明：雲南美術出版社，2001年），頁4-5。

（一）華嚴教主與大日如來手印混用

華嚴與密法本來就有一定的聯繫關係，按佛教史而言，華嚴教法為顯教中最終的完滿大集成，闡述佛的境界、菩薩行、以凡轉聖入法界，進入華嚴教主身，對於後來密教有深遠的影響。宋遼金時期，有時認知上將華嚴教主與密法的大日如來視為同等重要，在造像上產生混用的情況，因此將華嚴教主雙手結手結智拳印，頭戴五佛寶冠，身著袈裟的樣貌出現。華嚴教主身著袈裟源於北朝至唐以來，常見的造像傳統延續。密法金剛界的大日如來，則身著菩薩裝，披瓔珞裝飾，頭戴五佛寶冠，雙手胸前結智拳印。

遼、金、西夏的華嚴教主常見到，雙手胸拳智拳印，頭戴寶冠或不戴寶冠的樣貌出現，例如山西應縣木塔出土遼代的《大法炬陀羅尼經》卷第十三的扉頁〈佛會圖〉，與山西博物院藏《中阿含經》卷第三十六的扉頁圖雕版同。¹⁷扉頁圖與經文內容，二者並無聯繫關係，為一版多用，畫面中的華嚴教主便呈現此造型，並戴寶冠。在 1981 年大同市四老溝磚塔地宮出土，繪製於金大定十二年（1172 年）的〈殘佛像帛畫〉也是如此。黑水城出土金代刻本編號 TK142 的〈普賢行願變相圖〉亦是如此。黑水城出土西夏刻的華嚴教主皆身著袈裟，雙手當胸結智拳印，頂上有戴冠與不戴冠之別，戴冠作品為 TK61，不戴冠 TK72、TK98、Dx8270 等等。至於，宋土的華嚴教主，通常身著袈裟、頭戴寶冠，但手不喜用智拳印，在江浙一帶喜用佛光三昧印，例如杭州飛來峰石窟，於北宋乾興元年（1022 年）所刻，第 5 窟〈盧舍那佛會〉便是如此。¹⁸在四川、重慶一代喜用抱拳印，例如安岳茗山寺第 5 窟、安岳毘盧洞第 8 窟、安岳華嚴洞的華嚴教主皆是如此。

大理國佛圖塔出土《華嚴經》的〈七處九會圖〉，與元寧齋藏《華嚴經》的〈七處九會圖〉中的華嚴教主，皆是雙手當胸，右手在上，左手在下，結智拳印，反而與宋代的華嚴教主慣用手印有別，與遼、金、西夏的華嚴教主常用手印相同。但大理國的華嚴教主都不戴冠，而遼、金、西夏卻常用之。此外，大理國的造像還融合當地的造像文化特色，〈七處九會圖〉中的多尊華嚴教主偏袒右肩，露出右胸與右手臂的造像，此與宋、遼、金、西夏的華嚴教主常使用通肩式袈裟有別。

（二）華嚴教主眷屬的菩薩配置

華嚴被視為圓教之法，教義思想上以「十」圓滿，在宋遼金時期，華嚴教主兩側配置脅侍菩薩，常見較簡易的配置，便是配置文殊與普賢菩薩，構成華嚴三聖為主，而外圍有時在配置其餘菩薩、天龍八部護法等眾，例如黑水城出土西夏本 TK61、TK72、TK98 的扉頁圖。另外，也有一類造像，是將華嚴教主兩側，共配置十尊菩薩，以表示華嚴十菩薩，象徵華嚴的圓滿與獨特性，例如黑水城所

¹⁷ 黃土珊，〈唐宋時期佛教版畫中所見的媒介轉化與子模設計〉，輯錄石守謙、顏娟英主編《藝術史的漢晉與唐宋之變》（臺北：石頭出版社，2014 年），頁 420-421。

¹⁸ 陳俊吉，《宋遼金時期華嚴造像研究》（南投：財團法人國際佛教法林基金會，2023 年），頁 79-112。

出土西夏刻本 D x8270、金代刻本 TK142。北宋元祐七年至紹聖三年（1092-1096年）山西高平開化寺大雄寶殿內的〈華嚴教主與華嚴十菩薩〉壁畫便是如此。臺北故宮博物院所度藏一套，北宋淳化至咸平年間（990-1000年）杭州隆興寺刊本《華嚴經》，第一卷配置一幅〈七處九會圖〉扉頁圖，其中畫面中心的佛會，體量較大，佛兩側各配置五尊菩薩，構成華嚴十菩薩。

大理國佛圖塔出土《華嚴經》的〈七處九會圖〉，各會主要以華嚴三聖像為主。至於，元寧齋藏《華嚴經》的〈七處九會圖〉中的華嚴教主，畫面中心華嚴教主，兩側各配置四尊菩薩，構成八尊菩薩，此八尊菩薩特徵不明確，難以一一辨別身分。華嚴體系使用八大菩薩明顯與宋遼金有別，而大理國如此運用並非偶然，因為另一幅佛圖塔出土《華嚴經》的〈文殊菩薩當機啟問圖〉，扉頁圖雖然與《華嚴經》無關，但佛身旁也出現八尊菩薩，構成八大菩薩。

八大菩薩在不同經典中，所排序都不同，依據大理國當時密法也有相當影響力來看，以及宋遼金時期，一般所指的八大菩薩為唐代不空（705-774年）譯的《八大菩薩曼荼羅經》：觀自在（觀音）、慈氏（彌勒）、虛空藏、普賢、金剛手、曼殊室利（文殊）、除蓋障、地藏菩薩。¹⁹爾後，宋代法賢（?-1000年）所譯《佛說八大菩薩經》也是此八尊菩薩。²⁰在雲南昆明地藏寺藏有一座經幢，大理國晚期所雕刻，在經幢第三級雕刻：普賢、金剛手、除蓋障、地藏菩薩，在第四級分別雕刻：文殊、觀音、彌勒、虛空藏菩薩，合計為八大菩薩，同上述經典記載。²¹

此外，佛圖塔出土《華嚴經》的〈七處九會圖〉與元寧齋藏《華嚴經》的〈七處九會圖〉，後者的雕版，對於後代的影響力似乎比前者大，在明初與晚明時期，出現覆刻板，但整體工藝水平與表現，不及大理國的原雕版。²²

（三）單幅善財童子雕版的展現

善財童子童子在《華嚴經》中為極重要的角色之一，整部《華嚴經》闡述佛的果德莊嚴世界，此世界的成就由無量劫以來，菩薩行的悲願所建構而成，善財童子於佛會中受到文殊菩薩的啟迪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菩薩指引南參諸善知識，最終圓滿佛道，闡釋由凡轉聖的歷程，最終圓滿證入法界，所證之境界等同華嚴教主、普賢菩薩、文殊菩薩等等。

在北宋器重善財童子參訪諸善知識的情節，將「入法界品圖」轉換成獨立造像的「五十三參圖」，例如《善財參問變相經》、《文書指南圖讚》傳世。²³遼、金、

¹⁹ [唐]不空譯，《八大菩薩曼荼羅經》，收錄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第20冊，頁675上-676上。

²⁰ 此經八大菩薩順序如下：妙吉祥菩薩摩訶薩、聖觀自在菩薩摩訶薩、慈氏菩薩摩訶薩、虛空藏菩薩摩訶薩、普賢菩薩摩訶薩、金剛手菩薩摩訶薩、除蓋障菩薩摩訶薩、地藏菩薩摩訶薩。〔北宋〕法賢譯，《佛說八大菩薩經》，收錄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第14冊，頁751下。

²¹ 劉長久主編，《中國石窟雕塑全集：雲南 貴州 廣西 西藏》第9卷（重慶：重慶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圖版說明頁29-30。

²² 圖片參見，余鍾韻編，《雲南明清經本拓刻選》，頁4-5、17-18。

²³ 陳俊吉，《宋遼金時期華嚴造像研究》，頁19-22、149-175。

西夏也器重善財童子的角色，在黑水城出土的《華嚴經》扉頁圖中，於佛會中不乏出現善財童子於佛前請法，例如 TK61、TK98、Dx8270、TK142 等，甚至為了彰顯善財童子的菩薩行，在 TK98〈普賢行願變相圖〉，善財童子行普賢十大願的連環故事畫出現。而大理國卻將善財童子表現出，單幅版畫刊印於經文卷首與卷尾，闡釋善財童子在《華嚴經》的重要性。

四、小結

在宋、遼、金、西夏、大理國時期，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級特殊的時代，各地方的統治者對於佛教基本上給予扶持乃至成為國教，各政權境內都有《華嚴經》與華嚴教法流傳，卻展現出不同的佛教文化面貌。大理國所遺存的《華嚴經》相關扉頁圖，可以看出華嚴教主使用智拳印，此手印本為密教金剛界大日如來專用手印，此時期借用於華嚴教主身上，在遼、金、西夏亦有發現相關案例，表示顯教華嚴教主，與密法大日如來，視為同體亦名。而大理國的華嚴教主常見造像，頭頂不戴寶冠，身著偏袒右肩的袈裟，展現出地方的特色造像。此外，華嚴教主造像在大理國以外的地域，都是配置華嚴十菩薩為眷屬，展顯華嚴教法以「十」為圓滿的特殊性，而大理國受到密教的影響，卻配置八大菩薩，此種區域的獨特造像，一直持續到明末。此時，各地域的善財童子造像，基本上差異不大，主要都是童子貌的菩薩裝為主，用於華嚴佛會的扉頁畫中，呈現恭敬求法的樣貌。大理國的善財童子扉頁圖，還發展出單幅刻本，附在《華嚴經》的卷首與卷尾，這是其他地域《華嚴經》扉頁畫所未見到的情況。

圖片出處	
圖 1	楊世鈺、趙寅松主編，《大理叢書·大藏經篇》卷 1，彩圖。
圖 2	出處同上。
圖 3	楊世鈺、趙寅松主編，《大理叢書·大藏經篇》卷 5，頁 654。
圖 4	出處同上，頁 657。
圖 5	出處同上，頁 740-742。
圖 6	陳璞、尹恒編，《雲南古本經籍遺珍十種》，頁 7。

參考文獻

- 〔北宋〕法賢譯，《佛說八大菩薩經》，收錄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第 14 冊，臺北：世樺出版社，1994 年。
- 〔唐〕不空譯，《八大菩薩曼荼羅經》，收錄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第 20 冊，臺北：世樺出版社，1994 年。
- 〔唐〕佛陀波利譯，《佛說長壽滅罪護諸童子陀羅尼經》，輯錄《大正新纂大日本續藏經》第 1 冊，東京：國書刊行會，1975-1989 年。
- 〔唐〕實叉難陀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輯錄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第 10 冊，臺北：世樺出版社，1994 年。

- 李玉珉，《觀音特展》，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00年。
- 李霖燦，《南詔大理國新資料的綜合研究》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，1967年。
- 姜懷英、邱宣充，《大理崇聖寺三塔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98年。
- 張錫祿，〈宋明以來華嚴經典在雲南大理的傳播與應用〉，《華嚴學報》第5期，新北市：中華民國佛教華嚴學會，2013年6月。
- 陳俊吉，《宋遼金時期華嚴造像研究》，南投：財團法人國際佛教法林基金會，2023年。
- 陳璞、尹恒編，《雲南古本經籍遺珍十種》，昆明：雲南美術出版社，2013年。
- 黃士珊，〈唐宋時期佛教版畫中所見的媒介轉化與子模設計〉，輯錄石守謙、顏娟英主編《藝術史的漢晉與唐宋之變》，臺北：石頭出版社，2014年。
- 楊世鈺、趙寅松主編，《大理叢書·大藏經篇》，北京：民族出版社，2008年。
- 劉長久主編，《中國石窟雕塑全集：雲南 貴州 廣西 西藏》第9卷，重慶：重慶出版社，1999年。